

# 试论中国新闻史研究方法的创新路径

谭泽明

**摘要：**总结10年来的中国新闻史研究方法，不难发现，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贴合中国实际的新闻史研究方法仍未确立。中国新闻史本体意识的缺失、中国新闻史过分依赖革命史和政治史、缺乏理论性和系统性的问题仍未解决。中国新闻史研究应该借鉴中国历史的研究方法，以宏观视野审视100多年来丰富的新闻史料，培养研究的自信力，着力研究民族新闻史的特殊性，以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理论成果为依托，挖掘和归纳中国新闻发展和演变规律，创建符合民族实际的中国新闻史。

**关键词：**中国新闻史；研究方法；路径

**作者简介：**谭泽明，男，助理研究员。（广西大学 党委组织部，广西 南宁，530004）

**中图分类号：**G2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1）06-0018-07

1927年，戈公振先生《中国报学史》问世，标志着中国新闻史在学术研究上已步入系统的研究轨道。时至今日，中国新闻史研究走过了近90年的历程，中国新闻人对中国新闻史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并取得了累累硕果。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方汉奇等新闻研究前辈筚路蓝缕，甘坐冷板凳，为后之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中国新闻史研究资料和研究经验，其中，240万字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的出版，在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为新闻学科的建树做出了卓越贡献。随着研究语境和学术氛围的变化，学界对中国新闻史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入反思，开展了广泛讨论。在这方面，尤以2007年《新闻大学》“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体例、视野和方法——中国新闻史研究现状笔谈”的影响最为广泛，汇聚了业内老、中、青三代新闻研究学者的观点，掀起了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深入思考。

本文拟简要总结10年来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方法，梳理中国学者研究中国新闻史的思路和方法，针对中国的具体国情，试图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新闻史研究途径，开拓研究思路。

## 一、10年来中国新闻史研究方法

据不完全统计，10年来，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公开出版学术著作和新闻史教材超过40部（不含新闻历史人物研究专著），中国学术期刊网收录新闻史研究论文超过700篇，平均每年有4本著作问世，有70多篇新闻史专题研究论文发表，涵盖了中国新闻通史、断代史、专题史、地方史等，蔚为壮观。依据现有出版书籍和发表的学术论文来研究，我们发现，中国新闻史研究成果数量上虽然可观，但研究方法却仍旧比较单一、僵化，大多数研究成果缺少系统的治史理论和精神主线的支撑。“中国新闻史研究，基本上是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即以史料为依据，作逻辑上、理论上的综合分析”<sup>[1]</sup>，重视史料的发掘，特别是第一手史料的发掘，仍是一段时期以来新闻史研究的主攻方向。这符合方汉奇先生关于中国新闻史应该注意“多打深井，多作个案研究”的主张，所取得的成果有利于业界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大致来看，10年来的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方法主要呈现为以下三种类型：

### （一）继续以编年史的形式书写中国新闻史

目前，中国通用的各类新闻史教科书和各地方新闻史著作基本都采用编年史的方式编写中国新闻史，有选择性地铺陈各种史料。从本质上说，这样的研究距离新闻史学还有一定距离。作为编年的新闻史，记述了大量史料知识，即某年月某人创办某报纸，提出了办报主张，然后结合时代形势归纳办报特色和报道形式，最后指出办报的影响和该报的意义。如《西藏新闻传播史》（2005年）、《四川近代新闻史》（2007年）、《云南新闻史话》（2008年）、《浙江新闻史》（2010年）等基本属于这一写作类型。作为对历史文献的挖掘和整理，这样的工作必不可少，丰富了新闻史料。然而，由于受到研究方法单一、研究者视野不宽、学科发展不成熟等因素影响，一些研究成果和结论主观性较强，甚至有夸大影响之嫌。在一些作品中，研究者动辄用“影响深远”、“地位重要”、“重大影响”等词汇来形容和评价某一报刊，刻意拔高，牵强附会，以显示自己所做研究领域的价值。

### （二）尝试用国外新闻史研究方法或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解读中国新闻史

陈昌凤的《中国新闻传播史：传媒社会学的视角》（第二版，2009年）、吴廷俊的《中国新闻史新修》（2008年）等是这方面的代表。陈昌凤分析了美国新闻史的研究历程，认为其走过了一个从描述历史、解释历史，到今天运用社会学视角来书写新闻史的过程。在书中，陈昌凤分析了夏德森（Michael Schudson）《挖掘新闻——美国报纸的社会史》（Discovering the 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一书，认为该书为研究者提供了“比较经典的新闻史的视角和研究方法”<sup>[2]</sup>。但同时，陈昌凤又认为“媒介社会学只是一个研究范畴、一个研究路径，还没有形成科学的体系，还没有完成的理论框架”<sup>[3]</sup>，拿不成熟的国外理论研究中国新闻史，对于根基略显单薄的中国新闻史学来说显得不够审慎。《中国新闻传播史：传媒社会学的视角》就是作者参照美国社会学视角，研究中国新闻史的著作。吴廷俊力图突破“中体西用”的模式，找出一套符合中国新闻史情的研究路子，借用“媒介生态”理论来解读中国新闻史。他认为，“媒介生态”理论“作为新闻史研究的理论视角，主要就是研究媒介群落之间、媒介个体之间的竞合以及与生存环境之间如何保持动态平衡”<sup>[4]</sup>。作为有益的尝试，用国外的一些治史理论和方法、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来研究中国的新闻史，有利于扩宽研究者的认识视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发展。

### （三）“新新闻史”学观点的运用和发展

新历史学是西方史学研究的一个潮流，反对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强调史学家解释，重视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即史学功能。清华大学的李彬教授主张借鉴西方“新历史学”的观点，综合西方历史学研究理论的三大主张：“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历史都是文学史”，来研究中国新闻史。李彬称之为“新新闻史”学，“就是立足当下，面向历史，然后以社会史的范式和叙事学的方法，综合考察并书写新闻传播的历史衍变与现实关联。”<sup>[5]</sup>《全球新闻传播史（公元1500—2000年）》（2005年）、《中国新闻社会史（1815—2005年）》（2007年）均可作为“新新闻史”研究的代表作品。该主张与中国传统历史研究的“文”、“史”、“哲”思想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契合，在提高新闻史研究著作可读性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对新闻史研究具有促进作用。其研究开始向国内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倾斜，重点是以“大历史观”来审视中国新闻史，探索新闻本体的内在关系和与其他社会系统的关联。但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历史都是文学史”的观点来解读中国新闻史，略显生硬，仍未完全摆脱国外理论的束缚和影响，并且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 二、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本体迷失

综合来看，中国新闻史研究仍处于本体迷失的尴尬境地。虽然国内学者宁树藩等大声疾呼新闻史

研究应该回到新闻本体上,但实际操作中,新闻本体意识仍非十分准确和明晰。“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略显单一和僵硬”<sup>[6]</sup>,难以做到与中国新闻史的“无缝对接”。这种本体迷失主要呈现两种状况。

首先,中国新闻史研究难以把握自己的学科领域。对历史的研究应该回到历史的本身,“真正的历史应该是社会内容、事件史、记录事件所反映的价值史”<sup>[7]</sup>。中国新闻史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革命史、政治史、朝代史的烙印,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后,因照搬前苏联建设经验,中国新闻史研究也基本照搬了苏联新闻教学和研究的体例,沦为革命史和政治史的附庸。这一点仅从新闻史的分期问题上就可见一斑。可以说,中国的新闻史从一开始就缺乏应有的本体独立意识。由于本体意识不够强烈,无法突出中国新闻史的特色,导致在方法论上犯下致命错误,即以为史料的详细就是新闻史学。正是因为没有适当的方法和正确的认识,中国新闻史研究仍是大量史料的堆积研究,处于学科研究的初级阶段。梁启超认为,“从人类到今日,所有的一切活动,都有前后因缘的关系。倘使作史的时候,把他一段一段的横截,或更依政治上的朝代分期,略说几句于实际政治史之后,那么,做出来的史,一定很糟。”<sup>[8](225)</sup>中国新闻史研究就存在这种问题。我们并不是说中国新闻史与中国的政治史、革命史、社会史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说如何在这些关系中总结出中国新闻史的特殊规律,成为一个学科的特有的东西。

当下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对新闻史情的认识过于简单,对新闻人物的研究过于武断,对新闻报刊的论述过于表面,做出来的新闻史总在有意无意间靠向了其他学科,脱离了新闻史的研究领域。仅以《申报》为例:《申报》在当时的环境下如何运转,史量才如何能运作成功,《申报》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等等内容,当前的新闻史教程并未确切告诉读者。我们仅仅知道: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家报纸,很成功,能敌国民党的百万雄兵,它的名字叫《申报》。眼下的新闻史更像是报纸的起止流水账,在革命史和政治史的高大背影下存在。作为新闻史学,既要在“史实”上做文章,更要在“学问”上下功夫。

其次,中国新闻史研究无法割舍与西方新闻史的联系。国内一些研究者似乎对国外的新闻理论和传播理论情有独钟,经常舶来西方的新闻史研究方法,动辄用施拉姆、拉斯韦尔、霍夫兰等欧美学者的理论来阐述中国的情况,牵强地强加到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上,拾人牙慧,直接导致了研究方法创新力不足。如,有学者主张用传播学的理论来研究中国新闻史,认为20世纪西方史学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中国也应该借鉴国外的史学理论和观点来阐释中国新闻史,并提出了“以拉斯韦尔的‘5W’框架研究历史上的新闻传播活动和现象”、“通过媒介生态环境的研究来寻求新闻史的理解和诠释”<sup>[9]</sup>等观点。一些研究者眼睛总是向外看,希望能从国外学术界找到适合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方法,往往忽略中国近现代复杂的历史演变实情。作为解释性研究的经典之作,埃默里父子的《美国新闻史》在序言中给新闻史下的定义为:新闻史就是人类为了传播而进行长期斗争的历史,即发掘和解释新闻并在观点的市场上提出明智的意见和引人入胜的思想的历史。<sup>[10]</sup>这里的新闻史定义对于美国的新闻事业发展来说,应该还是比较贴合实际历史的,却并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若用这种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新闻史,不考虑中国历史的实际背景,不做更加深入和充分的创新性探索,则难以揭示中国新闻史的特殊演变规律。笔者以为,引进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无可厚非,在拓宽新闻史研究视野,增进中外交流上均有促进作用,但要在新闻史研究上获得突破性的成果却是难上加难,简单的“拿来主义”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新闻史。这与在钢筋混凝土的建筑上加一个中国元素的琉璃瓦屋顶就称是中国的房屋建筑一样,“中不中、洋不洋”,无法让人信服。机械地照搬国外的理论来研究中国新闻史,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照搬苏联模式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过分依赖国外新闻史研究理论,总是在追赶西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却导致了总落后于人的不利局面。

西方的一些理论的产生和应用是有其特定语境和特殊学术传统的,在不同的语境中和不同的学术

传统影响下，理论的效用也是迥异的。拿来西方的各种新闻理论、传播理论、史学理论来阐释中国的实际和历史，不从更深入的层面认识中国文化和汲取历史积淀，就难以理解中国100多年来的波澜壮阔的新闻史。不充分考虑中国的历史实情，是中国新闻史研究本体迷失的深层次原因。

笔者以为，正是找不到自身研究的核心领域、无法摆脱西方新闻史理论影响等原因，中国新闻史研究一直以来处于一种本体意识迷失的境地。本体意识迷失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忽略了中国历史的本体，在主观上没有把中国独有的历史看成新闻史的特殊性。可以说，在新闻史研究这一问题上，我们的研究者寻遍了各种方法，却唯独忘记了中国自身独有的历史状况，以及自身所拥有的文化遗产和历史积淀所提供给后人的宝贵财富。这需要从更高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新闻史的研究状况，找出中国新闻史的特殊性，研究中国新闻史的特殊性，用一套中国特有的历史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新闻史。

### 三、中国新闻史的特殊性及特殊要求

钱穆先生在谈到中国历史研究方法时，明确指出历史具有特殊性、变异性与传统性的特点。对历史特殊性的研究最有价值和意义，也符合学术研究实际，是实现世界学术研究精彩纷呈的必然要求。中国新闻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欲了解中国新闻史之特殊性，必先明白中国历史的特殊性。

#### （一）中国新闻业有特殊的历史追求

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表现在诸多方面，其中最大的特殊性就是五千多年的文化延续不断，中国的学术和思想大多为治理社会而服务的。“中国历史是盼由学术来领导政治，再由政治来领导社会，而学术由社会兴起，非受政府控制。”<sup>[11](88)</sup>只有知晓这一点，才能更好地理解近现代的报人为何将报纸“立言”放在第一位，更好地理解晚清政府末期的变革、辛亥革命的兴起以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立等史实，以及各阶层、团体将报刊言论功用发挥到极致的实际情况。各种言论和学说通过报刊这一载体，传播于广大受众，掀起了中国近现代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潮流。一个历史明证，中国人民并非一开始就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学术思想讨论，在缔造国家、政府的过程中均未获成功后，一部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开始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最终实践成功建立了新中国。中国的报刊是为国立学说、为民族立国家的。与西方相比较，这是中国近现代新闻报刊迥异于西方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是中国新闻史的独特之处，应该是新闻史学研究的着力点，而我们当下的新闻史却鲜见深刻反映。

#### （二）中国新闻业有特殊的历史背景

中国新闻发端于国家亟待振兴之际，最早的报纸创办人员王韬、梁启超等人，其创办报纸的目的与西方是有很大不同的。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家、民族与历史传统，几千年来国情民风，有些处迥异于他邦。”<sup>[11](36)</sup>西方报纸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渐兴盛，资本家办报的最终目的是出于对利润的追逐，报纸是私有的。虽然报纸业也在舆论导向、政府监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甚至被称为“第四权力”，但报纸也如同其他有形产品一样，是一种特殊的私有产品，利润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利润，或者利润减少以致亏损，其所有人完全可以让报纸转手或者死亡。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百年大报《基督教箴言报》宣布停止印发纸质版就是很好的明证。与之对应的，中国早期报业的创办并非主要出于对利润的考虑。王韬主张报纸应该“立言”，“为庶人之清议”（《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梁启超认为报馆“有助于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认为“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其办报的出发点与西方报纸有很大的不同。康梁在办《中外纪闻》时，报纸的资金几乎全部是募捐而来，报纸免费发放给在京官员。可以看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国民中的先知先觉者用报纸来启发民智，引导民众，出于救亡图存的目的，这是历史大环境的特殊需要。此外，中国的特殊国情难以确

定“第四权力”之外其他三种权力,盲目将国外学说移植到中国这片土地上,其功效适得其反。中国新闻事业虽然学习了西方报纸的壳,但实质却还是属于中国独有。不明白这一点,就难以理解中国的报纸何以多是知识分子在为之,难以理解邹韬奋等报人的前赴后继行为。

### (三) 中国新闻业有特殊的办报主体

中国新闻史上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办报的主体是知识分子,是国民中具有先知先觉的那部分人,是由“士”转化和演变而来的独特群体,秉承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思想。“‘士’的传统虽然在现代结构中消失了,‘士’的幽灵却仍然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地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人的身上。”<sup>[12]</sup>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大趋势是由封闭走向开放,中国新闻事业在这一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十分重要。知识分子无法运用国家权力实现改造国家衰败的命运,认识到报纸宣传舆论、教化民生的作用,通过报纸宣传各种主张,希望从下层开始变革启发民智,动员社会下层以达到改变国家命运的目的。报刊就是这一宣传目的的良好载体。中国知识分子有意无意之间成了报业的主力军,扮演了中国近现代历史最有力的推动者之一,中国新闻史上的维新潮流、民主革命潮流以及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潮流等等,均是中国报刊的不同于国外报刊的重要方面。中国新闻史的史情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野言朝,通过著书立说来改变王朝政治的传统有着天然相似之处。

不深入考察中国新闻史的这些特殊性,则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大损失,也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缺乏民族特色的症结所在。

## 四、创新中国新闻史研究方法的路径

学术研究的核心价值在于创新,创新的根源应立足本身。创新的思维不能仅仅局限于引进外来学术成果,创造新词汇。在当下研究环境下,以全新视角审视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文化,以沉着审慎的心态研究历史的变迁,以诚恳务实的工作开展新闻史研究,应该是历史研究的正常路径。本文所言含有“复古”的思想,但绝不拘泥于传统的文化束缚,而是希望重视中国传统的优秀思想成果,来分析和研究100多年来的新闻事业。须知“历史知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sup>[13]</sup>。换句话说,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决不仅仅是对历史本身的研究,更是密切联系着当下的社会变动,对当代中国新闻事业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创新中国新闻史研究方法是一个庞大的课题,笔者学识浅陋,不敢贻笑方家。有感于当下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境况,冒昧提出创新中国新闻史研究方法的三个路径。

### (一) 要培养研究的自信力

中国的新闻实践决定了中国的新闻史与西方新闻史不同的发展历程,盲目地追随西方眼花缭乱的各类理论,牵强地解读中国100多年的新闻史,不仅不符合中国的实际,而且追赶国外思想理论也无形中扼杀了一个民族的创造力。余英时先生就认为:“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虽然比西方落后,但史学一向自称系统而甚有光辉,有什么理由唯西方是从呢?”<sup>[14]</sup>一个常常跟随他国思想的民族是难以提高自身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又如何能够提高自身的自信力呢?同理,中国新闻研究若是过度依靠外来理论来指引我们的大脑,从心理上接受了国外思想理论较本国先进的潜意识影响,势必产生油然而生的挫败感,影响到中国新闻史研究。“我们是中国人,只有在中国史里来认识我们自己。”<sup>[11](2)</sup>中国的实际情况与西方的情况有着迥然的不同,要勘破中国新闻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就不能不从中国自身的实际历史出发,总结归纳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规律,探索研究新闻史发展的自身规律。不从根本上汲取中国的优秀思想和方法,认识到自己民族和国家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势必影响到自信力,而最终影响的将不仅仅是个体的研究者,还将影响到后之研究者和更长远的子孙后代。历史实践告诉我们,任何舶来的产品都不可能恰如其分地适合本国国情,推动本国进步的那只看不见的手,都是在本国的

实际情况中产生效应的。黄仁宇先生说：“最令我们存信心的，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以任何‘主义’解决问题都不可能是依样画葫芦，都是要处在绝境与‘柳暗花明’之中突过难关，创造出一种新环境。”<sup>[15]</sup>对任何一种思想理论，今天的研究者要有整合再造的信心和能力，结合实际，创新思想，找出民族历史发展的脉络。可以说，研究中国新闻史需要创新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方法，而方法的创新却是在国内，在自身对民族新闻史的认同和自信力上。

## （二）要注重民族特色，探索因果关系

考察中国的历史，其自身独有一套特殊的学术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孕育孵化，中国学术文化传统作为遗传基因，在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中绵延不绝，影响到每一个人。”<sup>[16]</sup>中国新闻史研究要走民族特色之路，重点探寻100多年来的新闻史演变规律，以期为后之新闻工作者提供可资借鉴的规律和认识。梁启超在解答“历史是什么”的问题时，认为历史是“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sup>[8](5)</sup>。意思是，中国的历史要记述中国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演变事相，归纳其成果和不足，探寻历史演变背后的因果关系，目的是要为当代人活动的借鉴。当前，虽然中国新闻史是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必修课程，但历史事件累积出来的新闻史味同嚼蜡，严重降低了学生学习和研究新闻史的兴趣。中国新闻史只有创新发展更好的治史方法，才能创造出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供后人镜鉴的史学。中国新闻史要走出一条创新的路子，就不能脱离民族历史的背景，就不能不联系中国100多年来翻天覆地的剧变的史情。期间发生的汹涌澎湃的新闻实践活动必有感动今天的东西，供当下的我们深入学习和思考。分析新闻事业的功绩，归纳本体发展规律，探索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以达成为今人“资鉴”的目的，才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真正需要完成的工作。

## （三）吸取中国历史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新闻史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中国文化绵延不断，中华文明的遗产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中说：“中国过去一百五十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十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sup>[17]</sup>中国近现代社会变化之剧烈前所未有。作为在社会变革中起重要作用的中国近现代报业，与王朝历史上的“断烂朝报”相比，所起作用非同寻常。相比西方新闻事业，中国新闻事业在民族国家发展中所承担的历史责任更大、更重，成绩也更加辉煌。中国新闻人的社会责任感无法等同于西方新闻事业，它同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紧密相连，也可以说是世代相传。研究历史最需要科学的态度，“要求历史工作者运用尽可能的手段，对客观历史进行越来越详尽的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再作出相应的判断”，<sup>[18]</sup>中国新闻史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其复杂程度绝非一般而言。简单地将别人的新闻史研究方法移植到中国新闻史研究中，不仅不能科学总结出中国新闻史的规律，反有障人耳目之嫌。所以说，探寻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规律，须先明白中国的历史和中国历史重知识分子的特殊地位。要深入研讨中国历史的发展，才能摸索出中国新闻人的特殊功绩，才能创造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闻史研究方法。这是业内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应该是今之研究者努力钻研之方向之一。

## 五、结束语

40多年前，钱穆先生就已经指出：“若中国人不能自己创制立法，中国今后将永远无望。”今天读来，仍具振聋发聩之效力。我们若不能独立创制一套方法来研究我们的历史，不能从文化遗产中汲取营养，培养自己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就难以在世界上立足。“只有着重于中国文化变迁的独特进程和形式，才有可能看清这个伟大的文化传统是如何被其内在的动力鞭策，从一个阶段进展到另一个阶段。”<sup>[19]</sup>新闻史研究者应该从国情出发，走民族创新的路径，培养自身的民族自信力，探索符合民族特

殊性的中国新闻史学。作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者,我们不能仅仅把国外理论引进来,套在中国新闻史学科的头上,而是吸取消化以服务于本国的史学研究。同时,我们更应该秉承文化遗产留给我们的优秀成果,在中国的国情中探究中国新闻史的演变规律。仅仅学习国外的理论,亦步亦趋,不是我们研究的目的,也不是我们和我们的后人所需要的。

### 参考文献:

- [1] 丁淦林. 20 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6):140.
- [2] 陈昌凤. 从哈德森到夏德森:美国新闻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谈[EB/OL]. <http://tech.sina.com.cn/other/2003-10-09/1706241976.shtml>.
- [3] 陈昌凤. 中国新闻传播史:传媒社会学的视角(第二版)[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4.
- [4] 吴廷俊. 中国新闻史新修[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绪论):2.
- [5] 李彬. “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J]. 新闻大学,2007(1):41.
- [6] 杨联宇. 浅论新闻史研究的未来路径[J]. 新闻爱好者:理论版,2008(12):75.
- [7] 徐正林. 中国新闻史[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8:15.
- [8]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外二种)[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 [9] 田秋生. 重写中国新闻史:必要性及其路径[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6):81-82.
- [10] (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南希·L. 罗伯茨. 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M]. 展江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原序):1.
- [11] 钱穆. 中国历史研究法[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 [12] 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新版序):6.
- [13]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引论):2.
- [14] 何俊. 余英时学术思想文选[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89.
- [15] 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增订本)[M]. 北京:中华书局,2007:250.
- [16] 谢鼎新. 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的演变[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145.
- [17] 黄仁宇. 中国大历史[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中文版自序):8.
- [18] 朱宗震. 史学方法与学术批评[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
- [19] 余英时. 人文? 民主? 思想[M]. 北京:海豚出版社,2011:5.